丁聪

大师的智慧

大师的智慧

我这个人从不做亏心事，再苦再累也吃得下、睡得香，因为我的良心安然。我的处事原则是：愿听逆耳之言，不做违心之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蒋晔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介

蒋晔，祖籍浙江省嘉兴市，1962年生于河南省商丘市，现任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5年开始进行20世纪500位中华杰出文化人物访问计划，现已访问300多位，其中有南怀瑾、冰心、费孝通、雷洁琼、启功、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还有宗教界人士本焕法师、觉光法师、夏荆山居士、汤恩佳等。出版有《我的生命中只有祝福》《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新世纪论语》《人生智慧丛书》《中国实践经济学探索》《白寿彝画传》《佛教图藏500罗汉》等近300余种图书。

2008年参与推动的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为“中国印”摩崖石刻所写的碑记，被北京奥组委所选定，镌刻在密云县云蒙山。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

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

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　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目　录

丁聪：我是一个老小孩 / 1
丁聪小传 / 18
丁聪的故事 / 19
小丁大智慧
——丁聪先生的人生对我的启发 / 136



丁聪：我是一个老小孩

我特别喜欢漫画，因为漫画能引人会心一笑，而笑对人的身心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没有幽默感、缺少幽默情趣的人，其生活肯定是枯燥乏味的。记得王蒙有一段话：“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

在1997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我在北京京西宾馆访问了丁聪先生。这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漫画家，我将平时保存的丁聪的漫画作品集随身带去，让丁先生大为兴奋。他一边翻着自己的漫画集，一边滔滔不绝地回忆起来。

三进三出香港

我们问丁先生：“前几天我们访问吴祖光先生时，他告诉我们您在香港生活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丁聪说：“是的。我在香港前前后后总共生活有10年的时间，三进三出。”

“您是怎么三进三出的？”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1937年的11月。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沦陷，我和张光宇、蔡楚生一道乘船来到香港，那年我21岁。在香港，我继续以漫画为武器，揭露日寇的暴行，宣传抗日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和夏衍、廖承志、潘汉年等同志接触很多，斯诺、爱泼斯坦还去看过我的画展。1939年，我跟随夏衍从香港来到越南，然后到达广西桂林，接着又到重庆。战时的重庆没有条件拍电影，电影胶片贵得很，于是大家就演话剧，我的主要任务是搞舞台设计。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重庆的进步文化活动采取种种限制和镇压手段。为了保存进步文化力量，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一部分文化工作者从重庆转移到香港。这时， 香港已聚集了很多文化界人士，进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我主要是编《大地画报》和参与排演抗日话剧《雾重庆》《北京人》等。这时，我画的漫画很少，主要是因为缺少发表阵地。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圣诞节那一天，日军突然包围了香港。后来，我们在东江纵队

的保护下，扮成难民逃了出来。要不是东江纵队全力保护香港的文化界人士，那损失就会太多了。当时东江纵队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深圳，我在那里呆了100天，对他们的印象太深了。前些年，广东一家杂志社派人找到我，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我在东江纵队的生活，我非常高兴，就画了一组回忆漫画。后来，我在深圳办展览，特意把这组漫画送给了深圳美术馆，以表达我对东江纵队的感念之情。

离开东江纵队后，我先后来到重庆、成都，参与排演了一些话剧如《牛郎织女》《祖国在呼唤》《北京人》《家》等，画了第一本插图《阿Q正传》。在这期间，为了揭露国民党在抗战后方的腐败统治，我又画了长卷漫画《现象图》。

抗战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上海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上海反蒋、争民主运动高涨起来。这时候，我画了很多反蒋的漫画，如《四海无闲田》《上海即景——天上飞下来和地下钻出来的‘劫收大员’》《民国万‘税’》等。这些漫画大都登在《周报》《文萃》《民主》和《群众》等报刊上。

与此同时，我还为讽刺蒋家王朝的话剧《升官图》，设计了漫画式的布景和服装。到了1947年，国民党加紧

迫害进步人士，查封了我和吴祖光合编的文艺刊物《清明》。在这种情况下，我随着上海文艺界的朋友第三次到达香港。在香港，我参加了‘人间画会’的活动，并画了揭露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镇压老百姓的漫画长卷《现实图》。到了1949年底，我和阳翰笙一起到达北京。”

“您三进三出香港，当时进出香港是不是很容易？”

丁聪说：“香港是个自由港，解放前进出不要护照，可以随便出入。正是这样，在战争年代，香港对保护大陆的文化界人士作出了贡献。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好得很，把香港收回来了，全世界华人都高兴。绝大多数香港人是中国人，香港的繁荣正是得益于中国人的努力。我们要把香港建设得更美好才对。”

“您在香港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应该说对香港是很有感情的，那您当年为什么还要离开香港到北京去呢？”

丁聪说：“因为那时在香港，中国人再多也没有做主人的感觉。”

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我问丁先生：“夏衍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您：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可悲、可叹、可笑的现象，做了形象的曝光和调

侃，似浅实深，小中见大，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针见血’……您对过去那个时代，是如何‘一针见血’的？”

丁聪苦笑着说：“解放后我先是‘当’上了‘美国特务’，然后又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分子’的‘大帽子’。直到1979年，前前后后一共被折腾了20多年。真是开了个大玩笑，这个玩笑太大了！”

“您怎么会是美国特务呢?”

“唉，奇怪得很。我在香港画抗日救亡漫画的时候，美国友人斯诺和爱泼斯坦曾经看过我的画展，我们还在一块儿合了影，这张照片竟成了一大‘铁证’。更重要的是，我的另一段经历，使我蒙上了阴影。

抗日战争末期，美国军队曾帮助过咱们中国对日作战。他们的军部在云南昆明，他们让我以秘密的身份进行抗日宣传。当时最有意思的工作是，敌占区的日本人贴出某个布告，我们就照着布告原样，重新设计了抗日的内容，然后再贴在日本人的布告上。解放以后，对我这半年的经历，组织上一直在审查。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在大陆没有任何人、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并不是‘美国特务’。直到‘文革’结束，有关方面才确认我并不是‘美国特务’。

到了反‘右’时，我的‘罪名’就更多了。还有，‘大鸣大放’的时候，热闹得不得了，我被搞蒙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直不说话，保持沉默，想看看再说。1957年5月，单位领导提出一定让我说话，结果‘鸣放’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分子’。1958年，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天，我到医院只看了他一眼，就被‘流放’到北大荒去了。我在一个农场里，劳动了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了农垦局宣传处，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当起了美术编辑。一直到1960年秋天，我才回到北京。”

与丁聪在北大荒相识、相知的丁继松先生，是这样描述当年情景的：“50年代末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北大荒文艺》编辑部，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作家、画家和编辑，如丁聪和聂绀弩都在那里。尽管带着心灵上的沉重创伤，但丁聪的脸上依然挂着乐呵呵的笑。

他是《北大荒文艺》的美术编辑，除了给作品画插图外，还要负责每期的版样安排、校对。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画的插图不仅没有稿费，还不能使用他一贯使用的‘小丁’之名。于是，他便起了‘学普’和‘阿农’的笔名。终审稿件送到印刷厂后，剩下的事儿便全落到他身上。每期刊物都有10万余字，他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

页码上出现了空白，他要画插图补上。直到杂志装订成册后被送往邮电局，他才能松上口气……在那个时候，编辑部的编辑们不仅要保质保量，及时编好稿件，而且还要在不断的劳动中改造世界观。丁聪的劳动态度被公认是最好的。”

丁聪接着说：“那一段，我夫人受罪了。她带着刚出生的孩子，远在北大荒的我，无法照顾她和孩子。后来，我先后在北京郊区的几个干校里放羊、养猪，什么活儿都干，曾在一个冬天里，把20多只羊放养到60多只。”

从1932年就和丁聪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夏衍先生曾说：“小丁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在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流放北大荒的时候，他总是笑口常开，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助人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我喜欢这样的人。”

丁聪讲：“在这20多年里，虽然失去了工作权利和作画的权利，但是只要有机会，我仍是不忘画画，偷偷地画。在北大荒时，我画我种的田地，我画我住的房子，外景、内景、全景等，还画过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我偷偷画画被人发现后，画笔被没收了，我就用剪子剪画，剪我养的猫、狗、猪、羊。我剪的画，很多人都来要，剪出多少就被抢走多少。

1976年9月，我从干校回到中国美术馆继续反省‘错误’。当时，美术馆里有许多作废了的卡片，背面很适合作画，我就想到要为鲁迅的小说搞一些插图。于是我每天偷偷画一幅草图。就这样，我画了33张。

有一天，我身体不大舒服，就到附近的医院看病。医生说我的血压很高，要休息一个星期。生病休假了，我不就有时间画画了吗？参加工作以来，我从没休过假，更不知道有病还可以休病假。这下可好啦！就这样，7天里我把偷偷摸摸画出来的插图草图在家里认认真真地重画了一部分。休息一星期后，这些插图还没有画完，于是，我就在复查的时候故意不吃药，再加上在检查我时，我憋了一口气儿，故意让血压仍然很高。就这样，我又休息了7天，这才把那33幅插图全部画了出来。”

我请教丁聪先生一个问题：“苦难可以磨练人的意志，使人更加坚信自己的信仰；也可以摧垮人的意志，使人消沉和堕落下去。您这20多年的劫难，怎么没有动摇您的信念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不起朋友的事，我死也不干。他们编织的那些罪名我都认了，但是让我揭发别人，我坚决不干。我这个人从不做亏心事，再苦再累也吃得下、睡得香，因为我的良心安然。自杀我也不干，死得不

明不白，没啥意思。如果真到没路可走的时候，我就顺其自然。我不想做官，也不挡别人的道；不爱抛头露面，出风头。我的处事原则是：愿听逆耳之言，不做违心之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小丁四十才结婚

就一个生活话题，我们问丁先生：“您刚才讲，1958年您才有了个儿子。那个时候，您已经42岁了。您是不是为了事业才这么晚要孩子呢？”

丁聪笑着说：“我可是个晚婚晚育的模范，我结婚的时候已40岁了。”

我好奇地问：“那个时候又没有提倡晚婚晚育，您为什么结婚那么晚？是不是有特殊的原因？”

丁聪讲：“不瞒你说，我看见女人就害怕。抗日战争那阵子，我一直是在电影和话剧的圈子里工作，经常看到圈内人结婚、离婚如同儿戏，今天和这个结婚，明天就离婚，后天又和那个结婚。我从来不敢问他们对方的情况，因为说不准人家刚结婚可又离了婚，搞得很不好意思。我这个人很重感情，对这种婚姻害怕得很，所以一直不敢谈对象。

解放后，我的年岁大了，便不大好找对象，心里就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